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『夷夏之辨』
和近代中国的
民族国家认同

李帆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『通古察今』系列丛书

『夷夏之辨』和近代中国的
民族国家认同

李帆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夷夏之辨”和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 / 李帆著. —
郑州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20. 8
(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215-12407-3

I. ①夷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民族主义-研究-中国-近代②民族国家-研究-中国-近代 IV. ①D092.5②D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135665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邮政编码:450016 电话:65788072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

1/32

印张 4

字数 57 千字

2020 年 8 月第 1 版

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

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

主 任 杨共乐

副主任 李 帆

委 员 (按姓氏拼音排序)

安 然 陈 涛 董立河 杜水生 郭家宏

侯树栋 黄国辉 姜海军 李 渊 刘林海

罗新慧 毛瑞方 宁 欣 庞冠群 吴 琼

张 皓 张建华 张 升 张 越 赵 贞

郑 林 周文玖

序 言

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，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是国家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，拥有国家重点学科、博士后流动站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，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。目前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，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。在教学方面，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、教材编纂、教书育人，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。在科学研究方面，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，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、被学术界誉为“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”的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后，一批底蕴深厚、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，如八卷本《中国文化发展史》、二十卷本“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”、三卷本《清代理学史》、五卷本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》、二十三卷本《陈垣全集》，

“夷夏之辨”和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

以及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》《中西古代历史、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》《上博简〈诗论〉研究》等，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，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，得到同行普遍好评。

除上述著作外，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，以探索精神攻关，又陆续取得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，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，始终处在学科前沿。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。丛书所收著作多以问题为导向，集中解决古今中外历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，篇幅虽小，然问题意识明显，学术视野尤为开阔。希冀它的出版，在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，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佳作。

当然，作为探索性的系列丛书，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，还望学界同人不吝赐教。

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
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
北京师范大学“通古察今”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

2019年1月

目 录

前 言 \ 1

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\ 3

清季民族国家认同理念之一侧面 \ 56

——以刘师培的论说为例

辛亥革命时期的“夷夏之辨”和民族国家认同 \ 68

再谈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 \ 78

参考文献 \ 111



前 言

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是政治史、思想史上的大问题。对中国而言，民族国家认同问题具有独特意义，因中国拥有数千年自主发展的文明史，政治形态、文化形态、思想形态乃至社会形态都独树一帜，固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格局更是在现代人常规的知识视野之外，具有天下国家、王朝国家相交织的特质和政统、道统相结合的体系，与众所公认的民族国家相距较远，而民族国家认同则是西力东侵、西学东渐的产物，并非传统中国的自然演化所引致。所以，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，须从古典中国的“夷夏之辨”起步，对华夏族或汉族认同、华夏族或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、天下国家与王朝国家的认同、中华民族的构建与认同、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等诸多问

题展开探讨，方能有所创获。本书即基于这样的思路，围绕以上命题进行了初步讨论，特别是就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最关键时期——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认同问题，做了一些粗浅探索工作，以期有裨于相关研究的深化。

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

(一)

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，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它所积淀的深厚文化，而且疆域广阔、民族多元，政治形态也呈早熟之状。在这样的国度里，民族认同、国家认同经历了非常复杂的过程，从古至今，一系列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认同。在这些观念里，首先需要提及的便是“天下”观念。

一般认为，中国人的天下观是在夏商之时孕育出朴素的原型，到两周时期进一步发展成长。殷商卜辞中虽然没有“天下”这一词汇，但从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，商人显然已有“中央”和“四方”的方位观，商

王在祖宗的庇佑下成为四方的统治者，这样的观念形成了此后中国人天下观的一个基本要素。“天下”一词应是在周初正式出现，《尚书·召诰》中有言“用于天下，越王显”。《召诰》的内容主要是周成王年长以后，周公告诫他的一番话，周公认为洛居“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道里均”，^[1]宜为王都，并使召公营洛邑。所以《召诰》中的“天下”即向天子纳贡之“四方”。成王之后，以“天下”指“四方”的文辞一再出现。但到了西周末，讽刺幽王的《北山》诗中有了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之语，这样“天下”一词又有新意，即“普天之下”。从此，“天下”似乎可有广狭二义，既指“普天之下”，又指“四方”内的“中国”。^[2]

对于“中国”这一概念，学者们也做过不少研究。于省吾教授考证：“商代甲骨文没有或、国二字”。^[3]可见“中国”这个词在周代以前还没有出现。从目前已知文献看，“中国”二字连用最早可见于周初。1963

[1]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四《周本纪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133 页。

[2] 参见邢义田：《天下一家——中国人的天下观》，刘岱总主编：《中国文化新论·根源篇》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3 年版，第 441—442 页。

[3] 于省吾：《释中国》，中华书局编辑部编：《中华学术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，第 6 页。

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一语，在《尚书·梓材》中也有“皇天既付中国民，越厥疆土于先王”一语，何尊为成王时器，《梓材》也为成王时所作，故“中国”一词至少此时已然问世。此后的先秦典籍中也一再有“中国”出现。那么，“中国”二字的含义何在呢？有学者归纳了先秦各类记载，认为秦汉统一前“中国”称谓有五类含义：一是京师之意；二是国境之内之意，即所谓国中；三是诸夏之领域；四是中等之国之意；五是中央之国之意。而且占最大多数的，则为第三种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。^[1]可见“中国”这一概念在先秦是多义的和在变化中的，但核心指的是“诸夏”。“诸夏”与周人由服制而来的内外层次观念相关。殷商的服制基本上只有内服、外服两层，周人发展为五服，但基本上也是内外两层，所谓邦内和邦外，即天子为中心、诸侯为外围、四夷为更外围的层状结构。这样，由亲而疏，由内而外，如《公羊传》所言“内其国而外诸夏，内诸夏而外夷狄”，诸夏以王室为中心，对夷狄而言是内，对王室

[1] 王尔敏：《“中国”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》，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371 页。

而言又是外。这种相对的内外关系可以扩大，也可分出更多层次，故“诸夏”也处在变动之中。不过尽管如此，“诸夏”列邦有其活动区域，也就意味着“中国”这一名词有地理上的意义。

以“中国”指“诸夏”，“诸夏”外为“夷狄”，这样的说法，在地理方位上的意义之外，还反映了一种文化观念。《公羊传》（隐公七年）说：冬，“戎伐凡伯于楚丘，以归。凡伯者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此聘也。其言伐之何？执之也。执之，则其言伐之何？大之也。曷为大之？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”。何休注曰：“因地不接京师，故以中国正之。中国者，礼义之国也。执者，治文也。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，故绝不言执正之，言伐也。执天子大夫而以中国正之者，执中国尚不可，况执天子之大夫乎！所以降夷狄尊天子为顺辞。”^[1] 这里明确言“中国者，礼义之国也”，是以“礼义”界定“中国”之范围，而“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”，则表明“夷狄”与“中国”之别在于它的“无礼义”。“礼义”者，文化也，以“礼义”界定“中国”，实际表明

[1] 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三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下册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209页。

了一种对“中国”的文化认同。有关“夷夏之辨”的一些说法，如孔子曰：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孟子曰：“吾闻用夏变夷者，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其核心意旨，皆是从文化观念出发区分夷和夏，换言之，是从文化观念上区分“夷狄”与“中国”。

由于“天下”有广狭二义，而“中国”既为地理概念，又有文化含义，所以“天下”与“中国”之间也不能完全画等号。前已言及，“天下”可以指“四方”内的“中国”，先秦时言“天下”而指“中国”者，大有人在。不过作为广义所指，则“天下”大于“中国”。就文化而言，周人取得了辉煌成就，连孔子也对此感叹：“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所以周人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，并逐渐看低那些文化迟滞不前的邦国，将其斥之为“蛮夷戎狄”。于是“在周人的观念里，天下就是由文化较高的华夏诸邦和落后的蛮夷所组成”。^[1]如《国语·郑语》所载西周末时太史史伯之言，就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，他说：“当成周者，南有荆、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；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

[1] 邢义田：《天下一家——中国人的天下观》，《中国文化新论·根源篇》，第448—449页。

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；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；东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；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，则皆蛮、荆、戎、狄之人也。非亲则顽，不可入也。”^[1]这里所言“非亲则顽”，将“蛮、荆、戎、狄”斥为“顽”，余者则为“亲”，实际是很明确地将天下的邦国分为了两类，即蛮夷诸邦与华夏诸邦。华夏诸邦是为“中国”，系“天下”的一部分。由于殷商时就认为己居天下之中，自称“中方”，所以“中国”虽为天下一部分，但处“天下”之中。当然，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，“中国”“天下”的概念是可以扩展的。有学者已经指出：“各时代的人所实际认知的地理意义的天下越宽，其具体的所指就越广。后来不论多少服或以其他名目呼之，要皆在某一界限划分较具根本区别的‘内外’。在大多数时候，这一内外区分是与夷夏之辨关联呼应的。”^[2]这方面，《周礼》的记载可为佐证。《周礼·大行人》说王畿之外有六服，即“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、要”，“九州之外，谓之蕃国”。对

[1] 《国语》卷十六《郑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507 页。

[2] 罗志田：《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》，《学人》第 10 辑，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383 页。

于“要服”，郑玄注曰：“要服，蛮服也。”^[1]《周礼·职方氏》已有九服，王畿之外，有“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、蛮、夷、镇、藩”九服；《周礼·大司马》有同名的“九畿”。贾公彦疏曰：“云蛮者，縻也，以近夷狄，縻系之以政教。自此（即蛮服）已上六服，是中国之九州，自此已外，是夷狄之诸侯。”对“藩服”的解释是：“云蕃（同藩）者，以其最远，故得蕃屏之称。”^[2]这里所言“九州”指的是“要服”（或曰“蛮服”）以上的六服，即“中国”之谓，而“天下”则包含“九州”之外的“蕃国”，即“夷、镇、藩”三服，所谓“夷狄之诸侯”。显然“天下”大于“中国”，而且“中国”之界限关联着夷夏之别。由于“中国”已包含了“蛮服”，故比此前的“诸夏”范围要宽。至于对“藩服”的解释是因其最远，“故得蕃屏之称”，似乎表明蕃屏之外，仍有广大未可知的区域，则“天下”所指还可扩展。

秦统一后，中国人的天下观有所发展，概念更明晰了。汉代之时，“天下”有三层含义：最狭义的第一

[1] 《周礼注疏》卷三十七，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892页。

[2] 《周礼注疏》卷二十九，《十三经注疏》上册，第835页。

层“天下”即所谓“赤县神州”；第二层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“蛮夷”的各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；第三层以为中国之内有九州，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。^[1]第一层含义显然与“中国”概念是重合的，第二层与《周礼》所言颇一致，第三层则将《周礼》言之未详的更广阔的世界包容进去，对中国人来说它们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。此后，中国人的天下观总随世变而推移，但到近代之前，大体没有根本变化。在政治和文化角度，尤其是文化视角上，“天下一家”思想总是和“夷夏之防”观念相交织，即国力强盛时往往是“天下一家”思想占上风，国力衰弱时则更多强调“夷夏之防”。这样的天下观，与其说是地理意义上的，毋宁说是文化意义上的。

伴随着秦的统一，“中国”一词的含义也越来越明晰。秦汉之时，“‘中国’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三层含义。一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；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，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

[1] 姚大力：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》，《中国学术》第12辑，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，第193—194页。